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
名学者传记丛书

梁启超

学术思想评传

陈鹏鸣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戴逸 主编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

陈鹏鸣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 / 陈鹏鸣著. -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5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 戴逸主编
ISBN 7-5013-1622-8

I. 梁… II. 陈… III. ①梁启超(1873~1929)-评传 ②梁启超(1873~1929)-学术思想-研究 IV. B25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3293 号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书名 梁启超学术思想评传
著者 陈鹏鸣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
发行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首都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0.5
字数 260(千字)
版次 1999年5月第1版 199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书号 ISBN 7-5013-1622-8 / B·90
定价 20.00元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房德邻 郑大华
曹鹤龙 刘卓英



任公五十六歲像

戊辰二月自題



梁 启 超 先 生
(1873-1929)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

(代序言)

戴 逸

回顾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应该说:这是一个丰收的世纪、创新的世纪、辉煌的世纪。一百年间,名家辈出,群星灿烂,成果丰硕,推陈出新。中国传统的学术发生蜕变,西方学术大量引入中国,在中西方学术的交流、撞击、融合中,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诞生,并迅速地茁壮成长。一百年内,各个学术领域均有新的突破和重大进展,构建了完整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体系。回顾和总结 20 世纪的学术发展,明辨其是非得失,是一桩很有意义的工作,是为了推进 21 世纪的学术,进一步建构中国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必不可少的重要步骤。

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有着璀璨的成果和丰厚的积累。它长期以来哺育了中华儿女、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性格与精神,在世界学术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但从 19 世纪中叶以来,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也带来了西方的学术文化。西学东渐,经历了几个阶段,先是器物文明的传播,其后是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传播,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西方的学术文化,涵盖广阔,影响深远,进入中国后生根、开花、结果。它改变了中国学术思想界以至全社会的发展方向和前进步伐,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跨进近代社会。其间,中学和西学、旧学和新学、传统学术和近代学术发生了激烈斗争和逐步融合。中国 20 世纪之学术即在这一斗争和融合的再创造过程中呱呱堕地。

中国近现代学术肇始于严复翻译西方的学术名著,19 世纪末,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向中国人介绍了进化学说,使中

国学术界的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此后,他又陆续翻译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的《名学浅说》,这些都是中国传统学术界罕有研究、著述的领域,中国近代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逻辑学得以借鉴,因之萌生。

1901年,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说明近代历史学与传统历史学之区别:“自世界学术日进,故近世史家之本分,与前者史家有异。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他大声疾呼,历史学必须冲破传统,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并认为这是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此时,夏曾佑编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我国第一部用章节体写作的具有近代色彩的中国通史。其他学科也在20世纪之初相继跨入近代时期,1910年沈家本创办的法学会和《法学会杂志》可说是近代法学的萌芽;王国维、罗振玉研究殷墟出土的甲骨可说是近代考古学的滥觞;章太炎研究印度哲学、王国维研究叔本华,开近代中国人研究外国哲学的先河;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鼓吹文学革命,中国近现代文学得以诞生,胡适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次用西方观点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分析研究。至于自然科学,19世纪后期已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等翻译了许多著作,做了大量准备。1915年,留美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中国科学社并创办《科学杂志》,中国近代的自然科学研究也逐步展开。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先进知识界为了挽救国家危亡,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产物。西方的各派学说,众多著作,像打开闸门的洪水一样,冲进中国。中国学者站在自己的基地上进行选择、甄

别、吸收，创造适应于自己时代的学术文化。学者们，作为中国人，生于斯，长于斯，在中国接受教育，必定会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20世纪的第一代学者，从旧时代过来，大都精通中国的传统文化。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文化的战士们，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吴虞等，他们为了完成除旧创新的历史使命，竭力反对旧传统，要与旧传统决裂，但实际上旧传统已渗进他们的血液里，他们不可能完全斩断传统。真像他们自己所说：他们是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进行了反戈一击。即使像陈序经那样的“全盘西化论”者，也不可能摆脱旧传统。只要你是中国人，曾受中国文化的教育，就不能完全摆脱中国学术文化的影响，“今日之我”不可能全盘反对和完全丢弃“昨日之我”。

同样，20世纪的中国学者，不管他的思想多么保守、顽固，也不可能完全反对西方的学术文化。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优越性日益明显，人们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它，全盘反对和摒弃西方学术文化的人也是没有的。近代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大多受西方的影响，西服革履、西装大菜、洋房高楼、汽车飞机，西方文明，无处不在，哪个人的生活能离开这些？茅盾在《子夜》中写的吴老太爷头脑冬烘，顽固不化，但从乡下来到了上海，口诵《太上感应篇》，居住的却是洋房，出门更非坐汽车不可。拖着辫子，倡导复古的辜鸿铭其实是受过西方完备高等教育的一位大学者。20世纪的重大特点是中西文化从斗争走向融合，人们都在亦中亦西、非中非西、中西合璧的文化氛围中成长。

两种异质文化的斗争和融合不会在短时间内结束。历史上，佛教文化传入中国，经历了汉魏两晋南北朝唐宋，儒佛之间发生激烈斗争和相互排拒，才逐渐地融合，产生了儒学化的佛学——禅宗，和佛学化的儒学——理学。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将西方文化带来中国，虽有徐光启、李之藻甚至顺治帝、康熙帝等上层人物的扶植，也遇到儒学的顽强抵抗，经一、二百年之久而烟消云散，并未能

生根、开花、结果。可见异质文化之间的融合,尤其是要从融合中诞生出新的学术文化,是一个长期、缓慢而艰难的过程。

鸦片战争后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这是历史上异质文化第三次进入中国,其声势之大,影响之远,大大超过了以前的两次。由于西方学术文化的先进性,使中国传统文化相形见绌,在上个世纪末,中学和西学的两军对战中,中学已阵脚大乱,败下阵来。必须吸取西学之长,“以洋为师”在中国学术文化的基地上重新创造,才能重建中国的学术文化。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经过中国学人们不懈的努力,20世纪的中国学术得以孕育成形,脱颖而出,并显示了崭新的面目和蓬勃的生命力。

20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大体上说,有以下特点:

一、以进化学说和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学术赞美上古时代的制度和人物,颂先圣而薄后王,把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视为道统所在,后世丢失了古代道统,故而欺凌争斗,社会日益退步。19世纪末,严复翻译《天演论》,社会进化的原理风靡全国,完全改变了陈腐观念,中国人懂得了用进化史观来观察和研究人类社会,得出了与古人全然不同的结论。这样,20世纪的学术文化抛弃了传统观念,树立起近代新观念。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掌握了科学的唯物史观,进一步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主观能动作用等等,把学术文化的研究置于唯物史观和科学方法的指导之下。20世纪中国的学术文化有了长足的发展。20世纪的中国学人全都信从进化原理。而在1949年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占有主导地位,在它的哺育下,诞育和成长了大批学者。

二、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中国传统学术,分成经、史、子、集,并不严格地建立在学科分类的基础之上,其中经学特别重要,凌驾于上,且涵盖一切。《易经》中包括数学、哲学、自然科学;《书经》中包括政治学、历史学、地理学;《诗经》中包括文学、艺术、

自然科学;《礼记》中包括政治学、伦理学、教育学;《春秋》中包括历史学、政治学。许多学科尚在幼年萌芽状态,尚未从笼统的经学中分化独立出来,学科之间的界线极为模糊。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茁壮成长、规模齐备,形成了新的知识分类体系。自然科学移植了西方几百年积累的学术成果,独立为一大学科。其中分门别类,学支林立,建立了数、理、化、生、农、工、医等大学科,门类繁多、内容充实,洋洋大观,达到了较高水平,且有裨于国计民生。而人文和社会科学中,文史哲分离,形成各自的专业,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社会学、新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新学科,纷纷诞生独立。由于 20 世纪人类社会的飞速进步,人们对自然、社会、人类自身的认识更加深入,知识量、信息量巨大增长,学术文化的内容日益充实,范围日益扩展,完全突破了传统的经、史、子、集的旧框架,形成了近现代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新的学科分类体系。

三、理性方法的运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够精密、逻辑不够严谨,推理判断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色彩。治学中带有直观感悟,冥心静思,自省修养等等。某些非理性的方法,如形象的、感悟的、信仰的、揣测的、情绪的方法,只要能表达研究对象或真实、或虚幻的状态,就能形成某种学术性的知识,如古代的瀛海九州说,天人感应说,明心见性说。20 世纪的中国学术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运用归纳和演绎,重视证据,“无征不信”、“孤证不立”,摒弃主观成见,抱着冷静、客观的态度,以理性方法对确定的对象进行具体、准确的认知活动。在自然科学中运用显微镜、望远镜、以及其它科学仪器和实验手段,在社会科学中则着重调查研究的方法,获取第一手的实际材料。20 世纪的学术文化追求的是精确而具体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丰富多样性,进而认识其本质和规律。近现代学术崇尚的是理性精神而非感悟、信仰或权威。

四、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国进入 20 世纪,帝国主义的侵略更加凶狠,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压迫更加残酷,内忧外患,民

不聊生。20 世纪的中国学者们目睹山河破碎, 人民苦难, 抱着无限的同情, 唤起自己的责任感, 慷慨以拯救天下为己任, 在各个学术领域中苦心探索, 矢志钻研, 目的就是为了救国。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是在风雨如磐的苦难岁月中诞生发育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 使国家富强, 人民幸福是 20 世纪学者们共同的强烈愿望。搞自然科学的希望科学救国, 搞经济学的希望实业救国, 搞教育学的希望教育救国, 搞政治学的希望国家繁荣昌盛, 搞哲学的希望振兴民族精神, 搞历史学的希望以历史经验教育和唤起民众, 搞文学的塑造了众多威武不屈的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20 世纪的中国学术文化伴随中国的苦难而产生, 它推动国家的前进、呼唤民族的奋起、激励大众的斗争, 因此, 爱国主义渗透其中, 成为它主要的精神支持。20 世纪的中国学术高扬着爱国主义的旗帜。

此文原为《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序言, 现作本书代序, 并加标题。

目 录

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概论(代序言)	戴 逸
引 言	(1)
第一章 说长论短话平生	(3)
一、才华横溢的青少年时代	(3)
二、维新运动的干将	(18)
三、亡命天涯	(37)
四、在民初政坛上	(55)
五、离开官场之后	(70)
第二章 著论求为百世师	(89)
一、清代学术史研究的不朽著作	
——《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90)
二、为后学指点迷津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	(97)
三、饮冰室文集的编辑与出版	(103)
第三章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梁启超和他的学术师友	(108)
一、梁启超与康有为	(108)
二、梁启超与严复	(124)
三、梁启超与黄遵宪	(139)
四、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	(151)
五、梁启超与胡适	(169)
第四章 博大理论 超前思想	(185)

一、“除心奴”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	(186)
二、“内热救黎元”——梁启超的政治思想	(201)
三、寻求富国策——梁启超的经济思想	(219)
四、倡导资产阶级新史学	(240)
五、“文须有益于世用”的文学思想	(255)
六、“学做现代人”的教育思想	(271)
第五章 身后是非谁管得	(290)
一、新中国成立前后梁启超的研究状况	(290)
二、改革开放以来梁启超的研究状况	(295)
三、海外学者的研究状况	(300)
四、我眼中的梁启超	(305)
附录 一、梁启超重要著述年表	(309)
二、重要研究论著目录	(317)
后记	(327)

引 言

1929年2月17日上午,北平广惠寺内哀乐阵阵,政界、学界名流云集,山门左右高悬阎锡山所送挽联:“著作等身,试问当代英年,有几多私淑弟子?澄清揽辔,深慨同时群彦,更谁是继起人才?”祭台前素花扎成的牌楼上缀以“天丧斯文”四个大字,左右悬挂熊希龄挽联一副:“十余年患难交深,有同骨肉,舍时去何先,著书未完难瞑目;数小时行程迟误,莫接声容,悲余来已晚,抚棺一痛更伤心。”佛堂内布满了祭联哀章,冯玉祥挽联为:“矢志移山亦艰苦,人才如海更纵横。”王士珍挽联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公直天下健者;生有自来,死有所归,我为斯世惜之。”冯、王二联泛泛而论,无甚新奇,倒是胡适一联较好:“文字收功神州革命,生平自许中国新民。”^①点出了逝者一生的贡献。

同日,上海各界人士也于静安寺举行公祭仪式,由陈三立、张元济主持,蔡元培、杨度等百余人前往吊唁。蔡元培挽联称:“保障共和,应与松坡同不朽;宣传欧化,宁辞五就比阿衡。”杨度挽联是:“事业本寻常,成固欣然,败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丁文江在挽联中以贾谊与其相

^① 此联据《梁启超年谱长编》云为钱玄同所作,但据《胡适的日记》及其他记载均言是胡适所作,另外,《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载挽联字句或有舛误,《引言》所记挽联,据《追忆梁启超》等书核对过。

比：“思想随时代而变，一瞬更何之，平生自任仔肩，政绩仅追刘正字；文章得风气之先，百身嗟莫赎，少日酬知宣室，声名突过贾长沙。”^①

逝者为谁？他的一生有何贡献？为什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名流前来致吊？他便是本书的传主——梁启超。

梁启超，这位时代的伟人，我们不会忘记他在青年时代便追随乃师康有为，鼓动公车上书，发起百日维新，唤醒沉睡的国人；我们不会忘记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写下的大量脍炙人口的报刊文章，鼓舞了无数渴望富国强军的英雄志士；我们不会忘记他在二次革命的战场上运筹帷幄，在反对张勋复辟的运动中身先士卒；我们更不会忘记他在晚年对于中国文化的巨大贡献……所有这些，我们又怎么能忘记呢？

斗转星移，蓦然回首，戊戌变法离我们已经一个世纪，岁月的长河不停地流淌，让我们暂且放下手边纷繁的事务，飞越时空，回到一百多年前，一同去考察这位伟人的 人生历程，品味他的酸甜苦辣……

^① 此联他书或记为王蕴章所作，此据《梁启超年谱长编》所记。

第一章 说长论短话平生

一、才华横溢的青少年时代

(一) 家乡与家世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清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

新会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南端，离省城广州仅100多公里，熊子乡在县城南面的熊海中，正当西江入海之冲，居江口7岛的中央，乡内共有5个村庄，以茶坑村最大。全乡居民以梁姓最多，故涉及全乡的大事，往往取决于梁姓。

新会县气候炎热，一年四季，草木郁郁葱葱。夏秋之间，常有热带风暴掠过，给居民的生活带来许多不便。老百姓多以薪炭耕渔为生，不善经商。由于靠近海边，土地贫瘠，收入极其微薄。贫困的生活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以及与外界缺乏交往，使得当地的居民保留着古朴之风，“士人尊师务学问，不逐虚名；仕者以恬退为乐，竞进为耻；尚门第，矜气节，慷慨好义，无所谄屈。”^① 幼年的梁启超生活在这种环境里，耳濡目染，深受影响。

梁启超的先世可追溯到宋末元初之际，由于当时中原地区蒙

^① 《新会县志》卷二，《风俗》。

古人的到来,为避战乱,梁绍始由福州迁居广东南雄。明末,梁谷隐又由南雄迁往新会,从此定居。梁启超的祖父名梁维清,号镜泉,生于清嘉庆二十年(1815),卒于光绪十八年(1892),兄弟8人,仅有数亩薄田,家境颇为贫寒。为了改变10世为农的命运,他苦读诗书,终于考中秀才,挂名府学生员,最后做上管理一县文教事务的小官——教谕,虽然教谕不过是不入流的八品小官,但却改变了梁家的命运,也给其家庭带来不少实惠。十几亩好田和不少图书,便是他当官的收获。

梁启超的父亲名梁宝瑛,字莲涧,生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卒于1916年,是梁维清的三子。梁维清对包括宝瑛在内的每个儿子都严格要求,满希望他们能在科举考试上有所成就,可是儿子们却屡屡名落孙山。无可奈何之下,梁宝瑛只得在乡里教授私塾。教学之余,也躬耕南亩,可谓“田可耕兮书可读”。梁宝瑛是位仁慈方正并热心公益事业的地方绅士,他以为对于学者来说,“淑身”与“济物”至关重要。“淑身”是指加强自身修养,故其生平不苟言笑,所行皆合于礼;“济物”指的是能“随所遇以为施”,如当时广东赌博之风极盛,梁宝瑛认为:“赌为盗源,欲化盗必先禁赌”,于是号召全乡禁赌。有些嗜赌成瘾者往往不听劝阻,依旧我行我素,梁宝瑛便“诲以利害,至于流涕”,^①终于感动得他们戒赌。父亲这种淑身济物的思想,对梁启超的影响很大,他后来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实际上便是“随所遇以为施”——根据自己遇到的社会问题,提出解救之道。

梁启超的母亲赵氏,出生于书香门第,粗通诗书,常教乡中妇女识字,习女红,以“贤孝”闻名全乡。赵氏生有4子2女,长子启超,次子启勋,三子5岁而夭,四子启业。生启业时,赵氏因难产而

^① 梁启超:《哀启》,《饮冰室合集·专集》之33,第127—128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下引此书简称为《合集·专集》或《合集·文集》。